

# 《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正误

智晓静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胡旭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361005

〔摘要〕总结《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误讹,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唐人因避讳导致的有意识误讹;二是传抄过程中字形相似导致的无意识误讹;三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误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二十五种有相关误讹的别集,进行集名辨正,从而集中地解决相关问题。

〔关键词〕《旧唐书·经籍志》 别集 误讹

〔分类号〕G256.1

## Correcting Errors of the Collection Titles in *Jiu Tang Shu · Jingji Zhi*

Zhi Xiaojing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Xiamen 361005

Hu X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mp;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the titles of collections in *Jiu Tang Shu · Jingji Zhi*,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firstly, the intentional errors resulting from taboo of Tang Dynasty; secondly, unconscious errors caused by writing similar fonts in making copies; thirdly, sorts of other errors. These errors introduce negative and deep effects that they must be corrected. Based on rel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errors of titles of 25 collections are discovered and corrected.

〔Keywords〕*Jiu Tang Shu · Jingji Zhi* collections errors

《旧唐志》源于唐毋巽《古今书录》,四十卷的《古今书录》实际上是二百卷的《群书四部录》的简编本,在递相传录的过程中,误讹较为严重。<sup>①</sup>前人对此多有辨正,但离集中解决问题,尤其是系统纠谬和成因分析方面距离尚远。本文参校相关史籍,对《旧唐志》别集部分一一查勘,并予以辨正。

## 1 避讳导致的误讹及辨正

《古今书录》和《群书四部录》成于开元年间,故唐玄宗李隆基及其以前的唐代诸帝之名是二书避讳的重点。其中一些别集名称,可能由于避讳的原因,被人为地改动过。《旧唐志》照录《古今书录》,后人往往失察,因而误讹日深。

### 1.1 避唐高祖李渊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李渊讳者有三种。刘宋《丘泉之集》“丘泉之”应为“丘渊之”,“泉”当为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隋志》作《丘深之集》,“深”亦当为避李渊之讳而改。《新唐志》复其原名《丘渊之集》。《宋书》有《丘渊之传》。《南史·顾琛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字

灵符、吴兴丘深之及琛,吴音不变”<sup>[1]</sup>。

萧齐《褚彦回集》“褚彦回”当作“褚渊”。褚渊字彦回。先唐别集,以字、号命名者鲜。《褚渊集》显系唐人避唐高祖李渊讳,遂以其字为集名,改为《褚彦回集》。《隋志》亦如是。《新唐志》复其原名《褚渊集》。《南齐书》、《南史》皆有《褚渊传》。

刘宋《江智泉集》“江智泉”当为“江智渊”,“泉”当为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隋志》作《江智深集》,“深”亦当为避李渊之讳而改。《新唐志》复其原名《江智渊集》。《宋书》、《南史》皆有《江智渊传》。

### 1.2 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李世民讳者有二种。隋《虞茂代集》“虞茂代”当为“虞茂世”,“代”当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

① 本文所论之《旧唐书》指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文中涉及相关正史,非特别说明的,均指中华书局点校本。为行文方便,本文简称《旧唐书·经籍志》为《旧唐志》,《隋书·经籍志》为《隋志》,《新唐书·艺文志》为《新唐志》。

讳而改。《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均复其原名《虞茂世集》。虞茂世为隋代人,生平不详。

唐《郑代翼集》“郑代翼”当为“郑世翼”,“代”当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唐音癸签·集录一》等皆复其原名《郑世翼集》。《旧唐书·文苑上》有《郑世翼传》,《新唐书·文艺上》亦有《郑世翼传》。

### 1.3 避唐中宗李显讳和避唐玄宗李隆基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和避唐中宗李显讳各一种。北魏《韩宗集》“韩宗”当为“韩显宗”,唐人避唐中宗李显讳,遂缺“显”字。《新唐志》不察,因之。《隋志》作《韩显宗集》。隋志成书时,尚无李显,故不避其讳。《通志·艺文略》亦作《韩显宗集》。《魏书》《北史》皆有《韩显宗传》。

后汉《王文山集》“王文山”当为“王隆”。《王隆集》显系唐人避唐玄宗李隆基讳,遂以其字为集名,改为《王文山集》。《隋志》著录《班彪集》时下有注:“梁又有《王隆集》二卷,亡”。《隋志》成书时,尚无李隆基,故不避其讳。《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等均从《隋志》,复其原名《王隆集》。王隆事迹见《后汉书·文苑传》。

## 2 字形相似导致的误讹及辨正

### 2.1 左同右异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左偏旁相同、右偏旁略异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曹魏《刘邵集》“邵”当为“劭”。此因袭《隋志》致误。考诸史籍,曹魏无“刘邵”而有“刘劭”。又“劭”与“邵”通,故“刘邵”当为“刘劭”或“刘邵”。《隋志》云“光禄勋《刘邵集》”,与《三国志·刘劭传》云劭“卒,追赠光禄勋”甚吻合。故《刘邵集》当为《刘邵集》或《刘劭集》。

曹魏《应瑗集》“瑗”当为“璩”。《隋志》著录《应璩集》十卷。因隋志无“应瑗”之集,而《旧唐志》《新唐志》无“应璩”之集,又因二集所记卷数皆为“十卷”,作者时代相同,所以二者可能为一人。可疑者为“应瑗”。考诸史籍,最早出现“应瑗”一名的,是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其卷六引了一首诗,明确指出作者为应瑗<sup>[2]</sup>。随后是徐坚的《初学记》,其卷十八引了一首诗,亦明确指出作者为应瑗<sup>[3]</sup>。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四承袭了颜师古之说,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七承袭了《初学记》之说,亦将二诗归为应瑗名下。但这两首诗都见于曹魏时期著名文学家应璩的作品集中。关于《初学记》的那首,陆钦立先生直云:“瑗乃璩之讹”<sup>[4]</sup>。这个见解同样适用于《匡谬正俗》中的那首诗及《旧唐志》和《新唐志》。故《应瑗集》当为《应璩集》。

晋《刘訐集》“訐”当为“訐”。考诸史籍,晋无刘訐。《隋志》著录《刘訐集》,校勘记云:“‘訐’原作‘訐’,据《魏志·刘放传》注及《世说新语·排调篇》注改。刘訐入晋官宗正卿。

《旧唐志下》作‘刘訐’”。《新唐志》亦作《刘訐集》二卷。《世说新语·排调篇》引《头责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贻、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訐”。刘孝标注“刘訐”时引《晋百官名》“刘訐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骠骑将军。訐,惠帝时为宗正卿”<sup>[5]</sup>。裴松之《三国志·刘放传》注云:“臣松之案,《头责子羽》曰:‘士卿刘訐字文生,正之弟也。与张华六人,并称文辞可观,意思详序’。晋惠帝世,訐为越骑校尉”。上述二则材料中的“刘訐”与《隋志》《新唐志》中的“刘訐”,为一人无疑。故《刘訐集》当为《刘訐集》。隋志校勘记云,“刘訐”原作“刘訐”,亦为形似之误。至于“刘訐”,实为南朝梁代处士,《梁书》《南史》皆有传。《隋志》著录《周捨集》时下有注:“梁有玄真处士《刘訐集》一卷,亡”。

### 2.2 左异右同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左偏旁略异、右偏旁相同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四种。晋《何桢集》“桢”当为“桢”。考《晋书》诸纪、传,“桢”、“桢”混用,《晋书·何充传》云充为“魏光禄大夫桢之曾孙也”,校勘记云:“《武纪》《四夷传》《魏志·管宁传》注引《文士传》‘桢’均作‘桢’。虞预《晋书·何桢传》‘何桢字元干’。此为明证,“元干”者,国‘国之桢干’也。《类聚》五十六引《文士传》亦作‘桢’”。据此,当以“桢”为准,故《何桢集》当为《何桢集》。

晋《阮冲集》“冲”当为“种”。考诸史籍,晋无阮冲。《隋志》著录《山涛集》时下有注:“又梁有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录一卷”。《新唐志》亦作《阮种集》二卷。《晋书·阮种传》云其“迁平原相”。可见《晋书》中的“阮种”和《隋志》中的“阮种”为同一人,《隋志》中的“平原太守”为“平原相”之误。“阮冲”显系“阮种”之误,故《阮冲集》当为《阮种集》。

晋《张俊集》“俊”疑为“俊”。《隋志》著录《王鉴集》时下有注:“梁又有宗正卿《张俊集》五卷”。《新唐志》著录《张俊集》二卷。《旧唐志》无《张俊集》,《隋志》《新唐志》无《张俊集》三集卷数相同,年代相若,疑作者为同一人。“张俊”或当为“张俊”之误。《文选》卷三十八表下张士然《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家人表》,李善注曰:“孙盛《晋阳秋》云:‘张俊字士然,吴国人也。元康中,吴令谢询表为孙氏置守家人,俊为文,诏从之’。《晋百官名》曰:‘俊为太子庶子’”。集属张俊之可能性甚大,故疑《张俊集》为《张俊集》。

晋《江淳集》“淳”或当为“惇”。考诸史籍,晋无江淳。《隋志》著录《顾和集》时下有注:“梁又有征士《江惇集》三卷,录一卷,亡”。校勘记云:“‘惇’原作‘淳’,据本志经部春秋类及《晋书·江统传》改”。《新唐志》作《江惇集》五卷。三集卷数虽略有不同,但时代相同,作者可能为同一人。《晋书·江统传》附《江惇传》谓“江惇”夸迈流俗,屡征不就,与《隋志》所云“征士”身份甚为吻合。故“江淳”为“江惇”之误,《江淳集》或当为《江惇集》。

### 2.3 整体形似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整体轮廓相似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晋《王祐集》“祐”当为“佑”。考诸史籍,晋无王祐。《隋志》著录晋散骑常侍《王佑集》三卷。《晋书·王湛传》附《王峤传》云:“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侯”。又,《晋书》杨骏、王济、王濛等传并作佑”。鉴于此,“祐”为“佑”之误明矣,故《王祐集》当为《王佑集》。

晋《阮循集》“循”当为“脩”二卷。考诸史籍,晋无阮循。《隋志》著录《虞敦集》时有注:“梁又有太子洗马《阮脩集》二卷,录一卷,亡”。《新唐志》亦作《阮脩集》二卷。《晋书·阮籍传》附《阮脩传》,云其字宣子,曾官太子洗马,与《隋志》“太子洗马《阮脩集》”吻合。故《阮循集》当为《阮脩集》。

萧梁《宗史集》“史”或当为“夬”。《隋志》著录梁司徒谘议《宗夬集》九卷,《新唐志》著录《宗夬集》十卷。《旧唐志》无《宗夬集》,《隋志》、《新唐志》无《宗史集》,三集卷数基本相同,时代相同,作者疑为同一人。考诸史籍,梁无宗史。《梁书》、《南史》皆有《宗夬传》。故《宗史集》或当为《宗夬集》。

## 3 其他误讹及辩证

除了避讳和字形相似导致的错讹外,《旧唐志》别集集名还出现了其他错讹情形,由于零碎不成系统,遂将其总为一类。

### 3.1 音同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音相同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晋《张抗集》“抗”当为“亢”。考诸史籍,晋无张抗,故疑为张亢。《晋书·张载传》附《张亢传》:“亢字季阳。……中兴初过江,拜散骑侍郎。出补乌程令,入为散骑常侍,复领佐著作”。《隋志》著录《贺循集》时有注:“又有散骑常侍《张亢集》二卷,录一卷,亡”。二则材料中张亢身份一致,《隋志》之张亢,为晋过江张亢无疑。故《张抗集》当为《张亢集》。

萧梁《沈君攸集》“攸”或当为“游”。考诸史籍,梁无沈君攸。《周书·萧督传》附《沈君游传》:“沈君游,吴兴人。……博学有辞采,位至散骑常侍。……有文集十卷”。《北史·萧督传》亦作“沈君游”。疑“攸”与“游”音近所致,《沈君攸集》或当为《沈君游集》。隋《诸葛颖集》“颖”当为“颍”。《隋志》著录隋著作郎《诸葛颖集》十四卷。《新唐志》亦作《诸葛颖集》十四卷。《旧唐志》无《诸葛颖集》,隋志和新唐志无《诸葛颖集》,三集卷数相同,年代相若,疑作者为同一人。考诸史籍,隋无诸葛颖。《隋书·文学传》、《北史·文苑传》皆有《诸葛颖传》。“颖”与“颍”不仅音同,而且形似,故《诸葛颖集》当为《诸葛颖集》。

### 3.2 官爵类

此类指对集名中官爵记载的含混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二种。《旧唐志》著录刘宋《临川王集》八卷。考诸史籍,刘宋时期,“临川王”有二位,一是刘道规,一为刘义庆,皆有集。《隋志》著录宋《长沙王道怜集》时有注:“梁有《宋临川王道规集》四卷,录一卷,亡”。又《隋志》著录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新唐志》著录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从卷数来看,旧唐志之《临川王集》显系刘义庆之集。

萧梁王筠《左右集》当为《左佐集》。《南史·王筠传》:“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梁书》亦如是著录。<sup>①</sup>《隋志》亦著录王筠《左佐集》十一卷,下有注:“并录”。所谓“左佐”,当指“司徒左长史”,王筠两度任此官职。故“左右”为“左佐”之误,《左右集》当为《左佐集》。

### 3.3 衍讹类

此类指人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疏漏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二种。晋《夏侯靖集》“夏侯”当为“夏”,侯为衍文。《隋志》著录《左思集》时有注:“梁又有晋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录一卷,亡”。《通志·艺文略》亦作《夏靖集》二卷。考诸史籍,两晋时期,无夏侯靖。《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六有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六章),卷一百五十七有夏靖《答陆士衡诗》。遂钦立先生据此推断隋志之“夏靖”与《文馆词林》之“夏靖”为同一人,得出夏靖“字少明,历任武昌太守、豫章太守,有集二卷”的结论。《晋书·熊远传》云:“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及静去职,远送至会稽以归”。《江西通志》卷四十六亦云“豫章太守夏静,会稽人”。《会稽志》卷六、卷九均云螺山有“晋会稽内史夏静墓”。《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云“晋会稽内史夏靖墓绍兴府志在螺山”。从上述记载来看,“夏靖”与“夏静”可能为同一人,何者为讹还难以判定。《旧唐志》既源于《古今书录》和《群书四部录》,大概后者抄录《隋志》之《夏靖集》时,衍出一“侯”字。《夏侯靖集》为《夏靖集》之讹是可以断定的,但《夏靖集》是否当为《夏静集》,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旧唐志》著录晋《范宣集》十卷,与《顾和集》、《张虞集》先后;又著录晋《范宣集》五卷,与《江彪集》、《江惇集》先后。《隋志》著录晋《王洽集》时有注:“梁有征士《范宣集》十卷,录一卷,亡”。《晋书·儒林传》云范宣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屡征不就,与隋志所云“征士”身份相合,故《隋志》著录的

<sup>①</sup> 旧本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此只录六官,每官十卷,合六十卷,加《尚书》三十卷,共九十卷,与“凡一百卷”不合。主要原因是将“吏部”与“左佐”作同一官职,谓之“吏部佐”,实为误读。事实上王筠既作过吏部郎,又作过司徒左长史。所谓“左佐”,即“司徒左长史”。

《范宣集》应是确凿的。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言及两唐志《范宣集》前后卷数齟齬时云：“二志上文已有《范宣集》十卷，此又云《范宣集》五卷，盖前十卷为《范坚集》之误，本志又误为《庾坚集》。……此五卷本与本志叙次相对勘，似即此《范宣集》十卷也”<sup>[6]</sup>。很明显，姚氏认为《两唐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实为《范坚集》，五卷本《范宣集》就是隋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旧唐志》无《庾坚集》是正常的，因为相关史籍中晋无庾坚，但无《范坚集》是不正常的，两处出现《范宣集》更非正常。但姚氏以《隋志》与《两唐志》的叙次对勘，推断十卷本《范宣集》为《范坚集》之误的结论，多少显得有些武断，因为《隋志》与《两唐志》同一作家叙次不同的情形很多。叙次不是不可依据，但不能成为绝对依据。《隋志》云《范宣集》已亡佚，但开元时期朝廷广征异书，大约重新得到发现。至于全帙还是残编，都有可能。如果是全帙（即《两唐志》的十卷本），那么《两唐志》著录的五卷本《范宣集》当为《范坚集》之误。如果是残编（即《两唐志》的五卷本），那么两唐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当为《范坚集》之误，也就是姚氏认为的那种情形。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只能说，《两唐志》著录的两部《范宣集》中，有一部当为《范坚集》。

### 3.4 误读类

此类指撰录者误读史书而导致集名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一种。《旧唐志》著录萧齐张融《玉海集》六十卷，似乎《玉海集》就是张融作品的全部。这可能是误读《南齐书》和《南史》中的《张融传》所致。《南齐书·张融传》：“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数十卷行于世”。《南史·张融传》亦有相似记载。据《南齐书》、《南史》之《褚渊传》，褚渊任司徒在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到建元四年（482年）（卒于是年）。褚渊与张融关于《玉海集》的对话，发生在此数年间

〔作者简介〕智晓静，女，1970年生，馆员，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4篇；胡旭，男，1969年生，副教授，博士，发表论文30篇，出版专著1部。

无疑。又据《南齐书》、《南史》之《张融传》，张融卒于南齐建武四年（497年），与褚渊和他关于《玉海集》的对话时间相距十五至十八年之久。也就是说，《玉海集》早在张融去世十五至十八年前就已经存在，它只是张融阶段性的作品集之一。《隋志》著录齐司徒左长史《张融集》二十七卷。下有注：“梁十卷。又有张融《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亡”。可见，萧梁时期，张融作品集有四部，疑《玉海集》、《大泽集》、《金波集》皆为张融手定的阶段性作品集，十卷本《张融集》为后人将未收入前三集之作又合为一帙。大约在唐人编《隋志》时，张融诸集亡佚严重，遂将所得之作合为一帙，名《张融集》。开元间，朝廷广征异书，张融部分亡佚之作又得发现，《群书四部录》的编者遂将张融所存之作，都为一集，又因《南齐书》和《南史》关于张融集名的记载，遂以《玉海集》名之。《古今书录》与两唐志沿用，一至于今。

《旧唐志》别集集名的误讹主要体现在先唐别集上，唐人别集集名除了避讳导致的有意识误讹外，基本准确无误。这是因为先唐别集流传既久，衍、脱、误、讹的情形本来就很严重。《旧唐志》所收唐人别集，限于从唐初到开元九年，在这百余年间，天下太平，无兵燹水火，文人别集保存较好，著录准确，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 参考文献：

- [1] 李延寿. 南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20
- [2] 颜师古. 匡谬正俗平议. 刘晓东, 平议.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192
- [3] 徐坚. 初学记.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0: 98
- [4]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72
- [5] 刘义庆.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笺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782
- [6] 二十五史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5768

(上接第80页)

密切值法概念清晰，每一参数意义明确，每一步骤意图明了，计算方法较为灵活，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实用性。此外，密切值法计算简单，计算量小，可处理的数据量大。同时，在进行排序和评价时，可方便地考虑不同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使结果更切合实际。

对于本例，文献[5]应用灰色关联度法对四家书商也进行了优选排序，得到相同的结果，但书商之间的优劣差别有时很小，给评定、优选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评价过程中既涉及多个层之间的权重分配，还涉及同一层内不同指标的权重分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作者简介〕楼文高，男，1964年生，教授，博士，常务副院长，发表论文90余篇；刘晖，女，1983年生，硕士研究生；石兰，女，1983年生，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1篇；陈锦秀，女，1980年生，助教，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8篇。

### 参考文献：

- [1] 胡永宏, 贺思辉. 综合评价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2] 王登瀛. 多目标决策方案优选的密切值法. 系统工程, 1989(1): 33-35.
- [3] 邓建. 多目标决策密切值法选优的理论及应用. 新疆有色金属, 2000(2): 10-14.
- [4] 孙晓雅. 层次分析法在高校图书馆图书供应商选择中的应用. 情报杂志, 2007(6): 143-147
- [5] 史敏鸽, 赵辉. 高校图书馆图书供应商的选择及其评价方法研究.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6(6): 48-52